

长期居住意愿对流动人口消费行为的影响^{*}

周明海 金樟峰

【摘 要】文章利用国家卫计委 2014 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考察长期居住意愿对流动人口消费行为的影响,并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和倾向性得分匹配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有长期居住意愿的流动人口人均月消费达 1 360 元,比其他流动人口高出 13.9%。有长期居住意愿流动人口的住房消费支出增加 20.7%,使其占总消费比重提高 1.3%,在所有支出中影响最大。长期居住意愿对省内流动人口的住房消费支出影响比跨省流动人口更大,增幅达 28.3%。文章认为,在当前的户籍制度下,政府可以通过居住证制度合理引导流动人口在流入地长期居住,加快流动人口从个体迁移向举家迁移转变,增加其在流入地的消费支出,尤其是住房的消费支出,为进一步的户籍改革提供基础。

【关键词】流动人口 长期居住意愿 举家迁移 消费行为 住房消费

【作 者】周明海 宁波诺丁汉大学经济学院,助理教授;金樟峰 宁波诺丁汉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研究背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流动人口的大规模迁移举世瞩目。然而,有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的平均消费水平和边际消费倾向比本地城镇居民分别低 14.6% 和 16%(陈斌开等, 2010;Chen 等, 2015)。大规模流动人口消费不足的现象没有得到广泛重视。21 世纪以来,随着流动人口规模的日益扩大,该群体消费低迷将严重制约中国消费市场的进一步扩大和升级。因此,理解流动人口的消费不足及其影响机制,对进一步拉动内需,实现经济增长由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至关重要。

现有研究主要从制度层面分析流动人口的消费不足现象,认为户籍是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在消费行为上存在较大差异的重要制度障碍。在户籍制度的约束下,流动人口不

^{*} 本文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课题“中国的代际流动性及其机理研究”(编号: 14JDLB01Z)的阶段成果。

能在流入地完全享受当地的教育和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迫使其通过缩减消费、增加储蓄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风险(Chen 等,2015;Dreger 等,2015)。严格的落户政策还将导致人口的短期流动,降低流动人口的永久性收入预期,使其更多储蓄暂时性收入,抑制正常的消费需求和支出(Chen,2017)。户籍制度造成的短期和频繁流动会使流动人口偏好非耐用品消费,约束其耐用品消费,从而抑制整体消费需求和支出(Chen 等,2015)。

尽管如此,现有研究对流动行为本身如何影响消费行为缺乏深入探讨。从居住行为看,流动人口的一大特征是在流入地的平均居住时间较短,有研究估计为6~8年(Meng,2012;Meng 等,2016)。在流入地居住时间短意味着流动频繁,这将直接影响流动人口的消费行为。虽然Chen 等(2015)研究认为流动的短期和频繁性会影响流动人口对不同消费品的需求,但未从居住时间和意愿的角度考察流动人口的消费行为。Chen(2017)初步得出居住时间与流动人口消费有正相关关系,但未探讨两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目前,国内从居住视角考察流动人口消费行为的研究较少,本文致力于填补这一领域文献的相对空白。

中国国内流动人口居住的短期性特征与国际移民的短期性特点非常相似。从理论上看,中国流动人口问题的研究与现有国际短期移民问题^①研究存在一定可比性。一方面,中国的户籍制度与国际移民准入制都对特定人群的流动形成限制。另一方面,无论是中国流动人口还是国际短期移民,均表现为从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迁移的动态特征,并且居住时间均受流入和流出地经济及非经济因素的共同影响。尽管中国流动人口与国际短期移民的分析框架在地域、政治、语言和文化等方面存在差异,但国际短期移民在迁入地的经济行为研究对中国流动人口的行为分析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具体来说,国际移民的短期性对移民个体(如消费、劳动供给和人力资本投资)的经济行为和决策产生重要影响(Dustmann 等,2016)。从消费角度看,短期移民行为增加了移民个体的收入不确定性,增强了其预防性储蓄动机,从而减少其在迁入地的消费需求和支出(Dustmann,1997)。不仅如此,在迁入地居住的短期性还会影响移民个体在迁入地和迁出地的资产配置(Dustmann 等,2010b),在迁入地人力和社会资本的投资(Dustmann,1999),以及向迁出地的汇款数量(Dustmann 等,2010a),而这些都是影响移民在迁入地消费行为的潜在机制。受数据的限制,目前学界主要利用跨国数据考察发达国家的短期移民行为,对短期移民行为及其后果的微观实证研究较少。

鉴于此,本文从迁移类型的角度考察流动人口长期居住意愿对其消费行为的影响,并试图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现有国际短期移民研究微观实证的不足。

① 国际短期移民指部分跨国移民到达迁入地并居住一段时间后,离开此迁入地,返回原迁出地,或到其他迁入地的情况。国际经合组织的国际移民报告(OECD,2008)显示,跨国移民在迁移后5年内离开迁入地的比例在20%~50%,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有所差异。

二、数据来源及变量选择

(一) 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数据平台提供的 2014 年全国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与心理健康专题调查数据库。调查范围涉及北京市朝阳区、山东省青岛市、福建省厦门市、浙江省嘉兴市、广东省深圳市和中山市、河南省郑州市和四川省成都市。调查对象为在本地居住 1 个月以上,非本区(县、市)户口的男性和女性流动人口(2014 年 5 月年龄为 15~59 周岁)。总样本量为 15 999。其中,99.3%的流动人口样本为务工经商及随同人员,其他流动人口(包括婚嫁、拆迁、投亲、学习、参军和出生等)占总样本的 0.7%。数据库包括流动人口的基本情况、就业、收入支出与社会融合等。

(二) 变量选择

本文根据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平均每月总支出及流入地家庭规模构建流动人口所在家庭的每月人均消费量,将其作为被解释变量。数据显示,流动人口平均月人均消费量为 1 263 元。本文主要解释变量为流动人口在流入地是否有长期居住意愿的虚拟变量。该虚拟变量的构建为:(1)根据本次流动在流入地已完成的居住时间信息,确认是否为短期流动人口。其中,短期流动人口为在流入地居住时间不到 5 年,居住时间 5 年及以上的为长期流动人口。(2)在短期流动人口(5 年以下)中,根据未来 5 年是否打算在流入地长期居住信息,进一步确认是否具有长期居住意愿。数据显示,69.4%的流动人口为短期流动人口,其中,79.4%的短期流动人口有长期居住意愿。

本文选择的控制变量为:通过流动人口所在家庭的人均收入、户主工作单位的所有制与行业类型等变量控制收入和工作因素对消费的影响;通过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参与情况控制预防性储蓄动机对消费的影响;通过流动人口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对当地语言掌握程度及流出地的虚拟变量等信息控制个人特征对其消费的影响;此外,本文还控制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家庭规模及流入地区的虚拟变量以考虑流入地经济规模的因素。

(三) 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 1 比较了有长期居住意愿和无长期居住意愿的短期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基本特征。从中可以看出,有长期居住意愿流动人口的人均收入为 2 719 元,比无长期居住意愿流动人口高 433 元。在人均消费方面,有长期居住意愿流动人口的人均消费为 1 360 元,比无长期居住意愿流动人口高 303 元。在住房消费方面,有长期居住意愿流动人口的住房消费占总消费比例为 23%,高于没有长期居住意愿流动人口(17%)。有长期居住意愿流动人口中享受雇主提供免费住房和食品的比例为 16%,低于没有长期居住意愿流动人口(29%)。在社会保障方面,有长期居住意愿流动人口中参加失业保险和养老保险的比例分别为 28%和 32%,高于没有长期居住意愿流动人口(22%和 26%)。有长期居住意愿流动人口中掌握当地方言的比例为 65%,高于没有长期居住意愿流动

人口(57%)。此外,有长期居住意愿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家庭规模更大,其平均家庭规模为 2.8 人,高于没有长期居住意愿流动人口(2.3 人)。另外,有长期居意愿流动人口在流出地拥有土地更少、拥有住房面积更小、有留守儿童比例更低。因此,有长期居住意愿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收入支出、社会保障参与和人力资本等方面,以及在流出地的基本特征均与无长期居住意愿流动人口存在明显不同。

表 1 居住意愿的描述性统计

变 量	有长期居住意愿 均值(标准差)	无长期居住意愿 均值(标准差)	二者差异 (标准误)
流入地基本特征			
人均收入	2719.17(3781.36)	2286.10(1422.11)	433.06(99.71)***
人均消费	1360.97(2816.30)	1057.73(791.92)	303.23(73.68)***
住房消费占比	0.23(0.17)	0.17(0.16)	0.05(0.01)***
单位“包吃包住”	0.16(0.37)	0.29(0.45)	-0.13(0.01)***
参加失业保险	0.28(0.45)	0.22(0.41)	0.05(0.01)***
参加养老保险	0.32(0.46)	0.26(0.43)	0.06(0.01)***
户主年龄	31.97(8.18)	29.89(9.28)	2.08(0.24)***
户主受教育年限	10.73(2.90)	10.19(2.77)	0.53(0.09)***
本地语言掌握程度	0.65(0.47)	0.57(0.49)	0.08(0.01)***
家庭规模	2.86(1.18)	2.34(1.26)	0.52(0.03)***
流出地基本特征			
是否有父母居住	0.68(0.46)	0.67(0.46)	0.00(0.00)
是否有子女居住	0.16(0.37)	0.26(0.43)	-0.09(0.00)***
耕地总面积(亩)	3.82(11.30)	4.70(14.11)	-0.87(0.34)**
住房面积(平方米)	143.99(91.85)	159.43(95.68)	-15.44(2.69)***
样本量	5732	1491	-

注:家庭规模按流入地同住家庭成员人数计算。*、**、***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三、计量模型和估计方法

(一) 计量模型

Chen 等(2015)比较了中国流动人口和本地城镇居民的消费差异,Dustmann 等(2017)比较了国际移民中非法移民和合法移民的消费差异。本文参考 Chen 等(2015)和Dustmann 等(2017)的做法,构建以下计量模型:

$$\begin{aligned} \text{Log } Y_i = & \alpha + \beta_1 \text{Temp}_i + \beta_2 \text{Logincome}_i + \beta_3 \text{Unemployment}_i + \beta_4 \text{Pension}_i + \\ & \beta_5 \text{familysize}_i + \beta_6 \text{age}_i + \beta_7 \text{educ}_i + \beta_8 \text{locallanguage}_i + \beta_9 \text{Subsidies}_i + \\ & \phi \text{ownership}_i + \phi \text{industry}_i + \chi \text{regionhost}_i + \psi \text{regionhome}_i + \varepsilon_i \end{aligned} \quad (1)$$

其中,Log Y_i 为流动人口^①所在住户人均月消费支出的对数; Temp_i 为流动人口是否有长期居住意愿的虚拟变量,没有长期居住意愿取值为 1,有长期居住意愿取值

① 本文以下所指的流动人口如无特别说明均指短期流动人口。

为 0^①。 $Logincome_{pc_i}$ 为流动人口所在住户上月人均收入的对数值; $Unemployment_i$ 和 $Pension_i$ 分别为流动人口在当地是否参加失业和养老保险的虚拟变量,参加失业和养老保险取值为 1,没有参加取值为 0; $familysize_i$ 为流动人口所在住户的家庭规模; age_i 为流动人口的年龄; $educ_i$ 为受教育年限; $locallanguage_i$ 为流动人口对当地语言掌握程度的虚拟变量,掌握本地语言取值为 1,不掌握取值为 0; $Subsidies_i$ 为流动人口所在单位是否提供餐住补贴的虚拟变量,提供“包吃包住”补贴取值为 1,不提供取值为 0; $ownership_i$ 为流动人口工作单位所有制的虚拟变量,包括国有企业、私营企业等 12 种类型; $industry_i$ 为流动人口所处行业的虚拟变量,包括制造业、建筑业等 20 种类型; $regionhost_i$ 和 $regionhome_i$ 分别为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地区虚拟变量;流入地包括北京朝阳区、山东青岛市等 9 个地区,流出地包括北京、河北等 32 个地区; ε_i 为误差扰动项。其中,系数 β_1 反映是否具有长期居住意愿的流动人口在人均消费量上的差异。

(二) 倾向性得分匹配法

流动人口是否具有长期居住意愿可能通过流出地的不同家庭特征影响其在流入地的消费支出行为,因而存在内生性问题,并可能导致基准的普通最小二乘估计结果存在偏误。本文利用倾向性得分匹配法,处理由可观测因素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匹配前系数是否高估取决于可观测因素对长期居住意愿虚拟变量的影响,因此匹配前后系数差异在方向上存在不确定。倾向性得分匹配的估计步骤为:(1)估计关于长期居住意愿的 Probit 模型;(2)根据倾向性得分获取基本特征相似的处理组(没有长期居住意愿流动人口)和对照组(有长期居住意愿流动人口);(3)根据匹配后样本估计流入地长期居住意愿对流动人口消费行为的影响。

倾向性得分匹配法的核心是变量的选择。本文选取流入地的人均收入作为影响流动人口长期居住意愿的关键变量,通过流动人口流出地是否有父母居住、流出地是否有子女居住、流出地耕地面积等信息控制流出地对流动人口长期居住意愿的影响。此外,本文用流出地的住房总面积作为流动人口拥有资产大小的代理变量,并利用流动人口所处行业进一步控制流入地的就业信息。关于上述变量的选择,本文参照 Chen 等(2015)的做法,构建的估计模型为:

$$Temp_i = \alpha + \beta_1 logincome_{pc_i} + \beta_2 age_i + \beta_3 parentrural_i + \beta_4 childrural_i + \beta_5 logland_i + \beta_6 loghouse_i + \phi Industry_i + \varepsilon_i \quad (2)$$

除了式(1)中出现的变量外,新增变量包括: $parentrural_i$ 为流动人口是否有父母住在流出地; $childrural_i$ 指流动人口是否有子女住在流出地; $logland_i$ 指流动人口在流出地耕

① 由于有长期居住意愿流动人口占调查总样本的大多数(79.4%),将无长期居住意愿流动人口作为处理组和被匹配对象能够最大化匹配效率。因此,该虚拟变量取值设置综合考虑了后续的倾向性得分匹配过程。

地面积的对数值; $\log house_i$ 指流动人口在流出地住房面积的对数值。

四、实证结果

本文首先考察长期居住意愿对流动人口人均总消费支出的影响。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全样本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表 2 所示。表 2 显示,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有长期居住意愿流动人口比没有长期居住意愿流动人口的人均消费支出高 14.3%,表明流动人口长期居住意愿与其在流入地的消费总支出存在显著正相关。同时,所在住户人均收入每提高 1%,其人均消费支出提高 0.66%,说明流动人口当期收入和消费存在高度正相关。单位提供免费住宿和食品使流动人口人均消费减少 28%,这反映了住房和食品支出在流动人口日常消费支出中的重要性。有失业保险的流动人口人均消费要高出 6.7%,但参加养老保险的流动人口人均消费量仅高出 2.1%,且统计不显著。一方面,参加失业和养老保险能降低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并增加流动人口当期消费(Chamon 等,2013);另一方面,养老保险较重的缴费负担会抑制家庭的现期消费(白重恩等,2012)。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参加养老保险对流动人口现期消费的增加效应较失业保险更小。户主年龄与人均消费显著负相关,反映了年轻人有更强的消费意愿。另外,户主受教育程度、对当地语言掌握程度对人均消费具有正向影响,反映了较高人力资本水平对流动人口消费具有促进作用^①。

考虑到流动人口的长期居住意愿可能是内生的,本文用倾向性得分匹配法选择基本特征相近的处理组(没有长期居住意愿)和对照组(有长期居住意愿)。利用式(2),本文估计影响流动人口长期居住意愿的因素。经过匹配后,处理组

表 2 居住意愿对流动人口消费的影响

	人均消费量的对数	
	匹配前	匹配后
无长期居住意愿	-0.143*** (0.013)	-0.139*** (0.016)
人均收入对数	0.665*** (0.011)	0.684*** (0.025)
单位“包吃包住”	-0.282*** (0.013)	-0.286*** (0.021)
户主年龄	-0.003*** (0.001)	-0.004*** (0.001)
受教育年限	0.012*** (0.002)	0.012*** (0.003)
家庭规模	-0.092*** (0.006)	-0.099*** (0.010)
失业保险	0.067*** (0.018)	0.045* (0.027)
养老保险	0.021 (0.017)	-0.015 (0.025)
本地语言掌握程度	0.031** (0.013)	0.052** (0.020)
观测值	6474	3227
调整的 R ²	0.645	0.629

注:控制行业、所有制、流入地和流出地虚拟变量。*、**、***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① 为了排除短期移民带来的影响,本文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首先,剔除婚嫁、拆迁、投亲、学习、参军和出生等原因的其他流动人口样本,仅保留务工经商及随同人员(占总样本 99.3%),研究结果基本不变。其次,与国家统计局保持一致,本文把流动人口定义为在本地居住 6 个月及以上的流动人口(占总样本 83.1%),回归结果保持稳健。最后,由于卫计委的调查侧重已婚流动人口(占总样本 60.6%),若只考虑已婚流动人口,回归系数略有变化,但显著性和符号仍保持不变。受篇幅限制,本文没有给出具体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与对照组在人均收入、户主年龄、流出地耕地面积、流出地是否有子女居住等方面不存在明显的差异(见表3)。将匹配后的样本再次用式(1)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表2显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有长期居住意愿的流动人口人均消费要高13.9%,略低于匹配前的估计结果。Chen等(2015)研究表明,由于户籍制度限制,流动人口相对于本地城镇居民的消费要减少16%~20%,而本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的长期居住意愿可以明显减少由户籍制度带来的消费抑制作用。换句话说,即使在未落户的情况下,长期居住意愿的增强有助于促进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总消费支出。这一结果可能反映长期居住意愿的提升伴随着流动人口收入不确定性和预防性储蓄动机的下降,从而导致其消费支出的增加。居住意愿的长期化还可能使流动人口更倾向于举家迁移,与个体迁移相比,举家迁移

者的消费明显更高(Meng等,2016)。

以迁移类型为中间变量可以解释长期居住意愿对消费结构和消费类型的影响。因此,本文进一步实证考察长期居住意愿对流动人口住房消费的影响,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有长期居住意愿流动人口的人均住房消费增加20.1%~20.7%。相比之下,在每月食品支出方面,有长期居住意愿流

动人口的人均消费增加15.4%~16.9%。而在除食品和住房外的其他支出方面(如衣、行、教育、通讯、医疗和娱乐等,不包括生产经营性支出和借贷支出),有长期居住意愿流动人口的人均消费增加8.7%~9.1%。上述结果表明,

表3 是否有长期居住意愿的影响因素

	匹配前	匹配后
人均收入对数	-0.073*** (0.010)	0.010 (0.020)
户主年龄	-0.006*** (0.001)	0.000 (0.001)
流出地是否有父母	-0.009 (0.011)	-0.001 (0.021)
流出地是否有子女	0.059*** (0.012)	0.012 (0.024)
流出地耕地面积对数	0.013** (0.006)	-0.005 (0.012)
流出地住房面积对数	0.043*** (0.007)	0.001 (0.015)
观测值	6649	3310
调整的R ²	0.0679	0.0009

注:控制行业虚拟变量。*、**、*** 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

表4 居住意愿对不同消费类型的影响

	食品支出		住房支出		其他支出	
	匹配前	匹配后	匹配前	匹配后	匹配前	匹配后
无长期居住意愿	-0.169*** (0.017)	-0.154*** (0.021)	-0.201*** (0.026)	-0.207*** (0.031)	-0.087*** (0.025)	-0.091*** (0.032)
观测值	6474	3227	5332	2563	6151	3075
调整的R ²	0.454	0.448	0.503	0.521	0.345	0.329

注:*、**、*** 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

表5 居住意愿对消费结构的影响

	食品支出比例		住房支出比例		其他支出比例	
	匹配前	匹配后	匹配前	匹配后	匹配前	匹配后
无长期居住意愿	-0.009 (0.005)	-0.005 (0.007)	-0.016*** (0.005)	-0.013** (0.005)	0.024*** (0.006)	0.018** (0.008)
观测值	6474	3227	6474	3227	6474	3227
调整的R ²	0.079	0.087	0.226	0.307	0.153	0.218

注:同表4。

长期居住意愿对流动人口住房消费支出的影响比其他消费支出更大。

表 5 估计了长期居住意愿对不同类型消费支出占总支出比重的影响。结果显示,长期居住意愿使流动人口的住房支出占比增加 1.3%~1.6%,同时使流动人口其他消费支出占比减少 1.8%~2.4%。由于长期居住意愿使总消费和食品支出保持同步增长,因而其对食品支出占总消费支出比重影响不显著。这再次证明,长期居住意愿对流动人口住房消费支出有更大的影响,说明长期居住意愿的增加会因举家迁移的可能性增加带来住房消费支出及比重的上升。

考虑到有长期居住意愿流动人口和无长期居住意愿流动人口在住房类型上存在差异,本文进一步估计长期居住意愿对不同住房类型(房租和房贷)的影响。估计模型上,本文在式(1)的基础上加入是否在流入地购买商品房的虚拟变量(已购买商品房设为1)及该虚拟变量与长期居住意愿的交叉项,估计结果如表 6 所示。综合无长期居住意愿和交叉项前的系数,长期居住意愿对已购买商品房的流动人口每月住房支出(房贷支出)的增幅达 183%~190%,远高于长期居住意愿对没有购买商品房的流动人口每月住房支出(房租支出)的增幅(16.5%~

16.6%)。上述结果表明长期居住意愿更多影响购房而非租房消费行为。长期居住意愿增加导致个体迁移向举家迁移转换,从而促使个体租房向家庭购房转变。

表 6 居住意愿对不同住房消费的影响

	匹配前	匹配后
购买商品房 × 无长期居住意愿	-1.665 ^{**} (0.661)	-1.741 ^{***} (0.141)
无长期居住意愿	-0.166 ^{***} (0.024)	-0.165 ^{***} (0.030)
购买商品房	0.842 ^{***} (0.038)	0.935 ^{***} (0.079)
观测值	5332	2563
调整的 R ²	0.546	0.549

注:同表 4。

从成本角度看,迁移成本大小决定了流动人口个体迁移或举家迁移的决策。对中国的流动人口来说,实际迁移成本不仅包括户籍制度下的落户成本,还包括迁移过程中由于地理、文化、社会关系等因素导致的成本。一种简单衡量迁移成本的方法是迁移距离,通常迁移成本随迁移距离的增加而增加。迁移距离越长意味着迁移成本越高,举家迁移的可能性越低。因此,省内跨市(县)流动比跨省流动的迁移距离短、成本低,举家迁移的可能性更高,因而产生更高的住房需求。为了检验长期居住意愿对省内流动人口比跨省流动人口的住房需求影响更大的可靠性,本文在式(1)的基础上加入跨省流动虚拟变量和该变量与长期居住意愿的交叉项,估计结果如表 7 所示。表 7 显示,在住房消费方面,有长期居住意愿的省内跨市(县)流动人口的消费增加 28.3%~30.7%,明显高于长期居住意愿对跨省流动人口的影响(12.2%~15.1%)。这意味着有长期居住意愿流动人口的住房消费受制于迁移成本的大小。由于省内跨市(县)流动的迁移成本相对跨省流动更低,其住房消费则相对更高。对于没有长期居住意愿的流动人口,省内和跨省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住房消费影响不显著。这意味着那些没有长期居住意愿

表 7 居留意愿对不同流动类型的影响

	人均消费对数		人均食品消费对数		人均住房消费对数		人均其他消费对数	
	匹配前	匹配后	匹配前	匹配后	匹配前	匹配后	匹配前	匹配后
跨省流动 × 无长期居留意愿	0.018 (0.025)	0.006 (0.030)	-0.035 (0.032)	-0.066 (0.042)	0.185*** (0.050)	0.132** (0.059)	0.006 (0.048)	0.022 (0.060)
无长期居留意愿	-0.153*** (0.019)	-0.143*** (0.023)	-0.150*** (0.025)	-0.119*** (0.031)	-0.307*** (0.038)	-0.283*** (0.045)	-0.090** (0.037)	-0.101** (0.046)
跨省流动	-0.023 (0.021)	0.018 (0.034)	0.022 (0.027)	0.048 (0.048)	-0.103*** (0.040)	-0.006 (0.078)	-0.057 (0.041)	-0.072 (0.068)
观测值	6474	3227	6474	3227	5332	2563	6151	3075
调整的 R ²	0.645	0.628	0.454	0.449	0.505	0.522	0.345	0.329

注：同表 4。

流动人口的住房消费与迁移成本关系不大。

五、研究结论

本研究结论主要有以下 4 个方面：(1)从消费水平看，长期居留意愿增加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人均消费，增幅达 13.9%。长期居留意愿可能通过降低流动人口的不确定性对消费产生正面作用，但更可能通过迁移类型的家庭化对消费产生积极影响。(2)从消费结构看，与其他消费类型相比，长期居留意愿对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住房消费支出影响更大。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使其在流入地的人均住房消费支出及比重分别增加 20.7%和 1.3%，其中购房消费支出比租房消费支出增幅更大。本文认为，长期居留意愿的增加提高了举家迁移的可能性，由此进一步增加流动人口的购房意愿，从而使住房消费支出及比重上升。(3)从迁移距离和成本分析消费差异看，长期居留意愿有助于增加省内跨市(县)流动人口的消费，其增幅为 28.3%，明显高于长期居留意愿对跨省流动人口的影响。这表明，有长期居留意愿流动人口更可能举家迁移，其住房消费的增幅因跨省流动的高迁移成本而缩小。换句话说，若迁移成本居高不下，流动人口即使有长期居留意愿也未必能够通过购买住房实现举家迁移。(4)居留意愿的长短可以改变流动人口的迁移类型，从而最终影响其消费行为。具体来说，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可以提高其举家迁移的意愿和概率，不仅增加了流动人口的总体消费水平，也使其消费支出更侧重于住房消费，特别是增加购房消费支出。

本研究的政策含义是增加流动人口居住的长期性有助于改善流动人口消费不足的情况，从而推动人口流入地甚至中国整体的消费升级和经济转型。增加流动人口居住长期性不仅应关注其居住时间的长期性，更应当关注其居留意愿的长期性，后者有助于优化流动人口的消费支出结构，形成对家庭住房、子女教育和个人医疗等重要消费支出的稳定和长期需求。2016 年国务院颁布实施的《居住证暂行条例》，将流动人口享受流入

地基本公共服务与其居住年限挂钩。在保持当前户籍制度整体不变的情况下,居住证制度鼓励了流动人口长期居住意愿,增加了流动人口举家迁移行为,促进了流动人口的消费支出,为流动人口有效融入流入地城市生活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另外,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力度,在流入地完善住房市场的“租售同权”和保障性住房制度,降低流动人口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门槛”,提高其在流入地的长期居住意愿。同时,政府还应配套相应的基础设施和制度保障,如加快区域交通设施建设、推进流出地土地流转制度,从而有效降低流动人口的迁移成本。同时政府应进一步推动户籍制度改革,有序推进城镇化进程,实现以消费为驱动的经济可持续增长。

参考文献:

1. 白重恩等(2012):《中国养老保险缴费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第8期。
2. 陈斌开等(2010):《户籍制约下的居民消费》,《经济研究》,增刊。
3. Chamon, M., Liu, K. and Prasad, E. (2013), Income Uncertainty and Household Savings in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05:164-177.
4. Chen, B., Lu, M. and Zhong, N. (2015), How Urban Segregation Distorts Chinese Migrants' Consumption?. *World Development*. 70:133-146.
5. Chen, X. (2017), Why do Migrant Households Consume so Little? Asia Development Bank Working Paper, 727.
6. Dreger, C., Wang, T. and Zhang, Y. (2015), Understanding Chinese Consumption: The Impact of Hukou. *Development and Change*. 46(6):1331-1344.
7. Dustmann, C. (1997), Return Migration, Uncertainty and Precautionary Saving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52(2):295-316.
8. Dustmann, C. (1999), Temporary Migration, Human Capital, and Language Fluency of Migrants. *The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101(2):297-314.
9. Dustmann, C., Fasani, F. and Speciale, B. (2017), Illegal Migration and Consumption Behavior of Immigrant Households.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15(3):654-691.
10. Dustmann, C. and Görlach, J. (2016), The Economics of Temporary Migra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54(1):98-136.
11. Dustmann, C. and Mestres, J. (2010a), Remittances and Temporary Migratio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92(1):62-70.
12. Dustmann, C. and Mestres, J. (2010b), Savings, Asset Holdings, and Temporary Migration. *Annals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7/98:289-306.
12. Meng, X. (2012), Labor Market Outcomes and Reforms in China.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6(4):75-101.
14. Meng, X., Xue, S. and Xue, J. (2016), Consumption and Savings of Migrant Households: 2008-14, in Song, L., Garnaut, R., Fang, C., & Johnston, L., eds., *China's New Sources of Economic Growth: Vol. I: Reform, Resources and Climate Change*. Australia: ANU Press.

(责任编辑:朱 犁)